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青年学者文库

THE CONCEPT OF
PACIFIC BASIN COMMUNITY
—Japan-Australia Initiativ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日澳倡议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探索

田凯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青年学者文库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日澳倡议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探索

THE CONCEPT OF
PACIFIC BASIN COMMUNITY
—Japan-Australia Initiativ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田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日澳倡议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探索 / 田凯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396 - 8

I. ①环… II. ①田… III. ①国际关系 - 研究 - 亚太地区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673 号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青年学者文库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日澳倡议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探索

著 者 / 田 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周 丽 高 雁

责 任 编 辑 / 冯咏梅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7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396 - 8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前 言 |

21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正急速地发生着变革。当今国际体系不仅表现出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性，还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流行性传染病以及恐怖主义等跨国课题面前同具脆弱性。在这场变革中，美国的霸权衰退迹象明显。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与 2008 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结构性矛盾之集中表现，更是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占据优势的世界开始转变的标志。^①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欧美新兴工业国家正逐步崛起，成为国际政策调整不可或缺的存在，二十国集团峰会（G20 峰会）的召开正代表了这样的趋势。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要依靠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国际机制网络体系来应对全球威胁。因此，曾经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世界的观点已经无法准确定义当今国际秩序，被称为“复合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②

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当今国际体系的大部分特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表现出来，这些特征标志着国际关系自那时起便已进入

^① 高原明生「序論：東アジア秩序論の諸問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東アジア新秩序への道程』（国際政治 158 号）、有斐閣、2009 年、1~2 頁。

^② 根据国际政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定义，“复合世界”指的是由文化和政治上多元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多个行为体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单个国家的霸权主义是不可行的。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 1~3 页。

了新阶段。^①首先，从大国关系上看，中美建交、中苏对抗以及美苏间的紧张缓和（Détente），表明美苏两极结构开始瓦解，冷战逐渐失去曾经的内涵。其次，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以致它决定不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货币制度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稳定战后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此同时，1973年与1979年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印证了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高端化”的过程。再次，1974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的决议，标志着南北问题等全球性课题被正式提上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以上事实均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便呈现出当今世界的样态，唯一不同的是彼时的世界并未预知中国会以如此惊人之速度崛起，并成为决定国际秩序和公共事务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在当时的世界，成为经济大国后的日本一直在寻求机遇，渴望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借助美苏冷战的紧张缓和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秩序变革，日本一方面快速实现了日中建交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取得了双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利用了越南战争后美国留下的政治真空，以经济为手段推进了对东南亚的外交，以此来构建地区新秩序。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正是在这样的战略延长线上，由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任期：1978～1980年）于1978年提出的亚太地区合作构想。日本与澳大利亚联手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最终促成了准政府间合作机制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PECC）的诞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将“太平洋”作为地区框架，以经济与文化交流等为合作内容，将中美两国囊括其中，是亚太国家构建摆脱冷战的

^① [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颜子龙、李静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31～158页。

地区秩序的尝试。冷战临近结束的 1989 年，以 PECC 为蓝本，亚太地区成立了第一个政府间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与推进过程中，日本的大平正芳政权在稳固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主导了整个构想的制定与实践过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之后，日本还将亚太地区合作作为外交“财产”保留，在 PECC、APEC、东亚共同体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推动过程中，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以来其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持续努力。虽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未对“宪法九条－日美安保体制”这一战后制约日本外交主体性的基本结构做任何变更，但与现在安倍晋三政权对美军事从属政策的狭隘视野完全不同，扩展了日本“自主”外交的空间与可能性。

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一直困扰于“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即与西欧的地理距离太远所造成的不安全感。^①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面对日本“南进”政策带来的威胁，澳大利亚开始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继续追随美国奉行“亲美反共”的对外政策，并与新西兰、美国结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 ANZUS）。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剧烈变革迫使澳大利亚重新修正了与美国的“距离”，决定从越南撤军及与中国建交，并将澳大利亚的国家转型方向定为“太平洋中等力量”。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澳大利亚的转型提供了契机，澳大利亚通过参与亚太地区合作进程，实现了其转变为“太平

^①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指出，澳大利亚史的形成主要源于它对远距离国家的深入且广泛的依赖而产生的矛盾。Geoffrey Blainey,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How Distance Shaped Australia's History* (Macmillan, 1982).

洋中等力量”国家的目标。此后，亚太地区合作亦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核心，正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提议，APEC 才得以诞生。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的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开端。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对于这一新生的地区性国际机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奇”。1986 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一起以“奥林匹克方式”加入 PECC。1991 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加入 PECC 的“奥林匹克方式”被 APEC 沿用，影响到 APEC 的组织结构。中国加入 PECC 正好与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政策的时期重叠，作为中国最早加入的地区合作机制，PECC 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区域性舞台。中国的加入使 PECC 超越了冷战结构，成为涵盖中日美三大国的最初的地区合作机制，同时也助力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施。

对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美国政府当初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毕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时，世界政治正处于从美苏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过程中。面对美苏对抗的新局势，美国的政策聚焦于政治与安全课题，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轴辐同盟体系（Hub and Spoke System），而非主张经济与文化合作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然而，美国国务院意识到了构建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间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因此对亚太地区合作采取了“不牵头但不拒绝”的态度。随着冷战结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任期：1993～2001 年）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亚太经济合作，为此美国还主导了 APEC 峰会的召开，这也标志着美国的外交重心向经济领域、向亚太地区转移，而 APEC 的创建也正是缘起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换言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型搭建了“前期平台”。

综上，本书旨在通过研究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

带构想的背景与理由，探究其具体内容及推进过程，阐释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外交倡议对构建地区秩序的意义，并揭示其对地区性大国中国与美国的影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既是亚太国家对摆脱冷战的亚太地区秩序的一次探索，也是唯一涵盖中美日俄的地区性政府间合作机制 APEC 存在的根源。当然，亚太地区各国间并不存在单一的目标，其在地区合作中所寻求的利益亦不尽相同，然而正是它们在“同床异梦”中寻求妥协，通过协商逐步构建互信，才最终促成了亚太地区的形成。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2
第二节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	6
第三节 文献综述	9
第四节 分析视角	18
第五节 本书构成	22
第二章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背景	26
第一节 日本的“太平洋”构想史	27
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	33
第三章 大平正芳的“观念”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39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生平与政治资源	40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44
第三节 大平正芳的国际政治观	52
第四节 20世纪70年代的时代认知	56

第四章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与内容	61
第一节 大平正芳学习会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案	62
第二节 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	65
第三节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	69
第四节 地区成员的范围与中国的课题	72
第五章 大平正芳政权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进	75
第一节 强化日美关系与对华经济援助	76
第二节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外务省准备工作	82
第三节 园田直与大来佐武郎的行动	91
第四节 大平正芳访澳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倡议	95
第五节 大平正芳政权对外政策的意义	97
第六章 澳大利亚的行动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100
第一节 澳大利亚历史中的 20 世纪 70 年代	101
第二节 澳大利亚最初的态度	106
第三节 堪培拉研讨会	108
第四节 澳大利亚的外访准备	115
第五节 克劳福德的东盟说服工作	118
第六节 澳大利亚的国家转型与亚太地区合作	124
第七章 后大平正芳时代日本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进	126
第一节 伊东正义与大来佐武郎	127
第二节 外务省与伊东正义外相	129
第三节 大来佐武郎的行动	133
第四节 伊东正义的辞职与东盟外长扩大会议	135
第五节 PECC 的成立与发展	137

第八章 中国加入 PECC 与地区成员的扩大	140
第一节 中国加入 PECC 的背景	141
第二节 中国态度的变化	143
第三节 亚太国际关系的改善与中国加入 PECC	152
第四节 台湾加入问题与“奥林匹克方式”	156
第五节 亚太地区成员的范围与中国	159
第九章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美国	162
第一节 美国的亚太地区主义	163
第二节 美国国务院的动向	164
第三节 布鲁金斯学会与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工作	168
第四节 美国的参与和 APEC	172
第十章 结论	175
第一节 战后日本史中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176
第二节 亚太地区中的澳大利亚	178
第三节 中国、美国与亚太地区秩序	179
参考文献	181
略语	204
后记	207

第一章 导 论

有时一瞬间很有价值，有时十年无任何意义，历史确实是奇妙的东西。^①

——大平正芳

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地区主义解释为“基于地理关系及相互依赖程度的（限定数量的）国家集团的形成”。^②而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准确概括地区主义的政治性特征。国际政治“地区主义”概念中的“地区”并非与政治、政策毫无关系的地理概念。同时，它与非政治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不同，^③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通过政府级别的联系，发展为拥有半恒久机构或成员“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运动。^④在地区主义推进过程中，因地区参加国对地区的范围、合作的目标

① 1978年11月27日，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获胜后的感言。大平正芳記念財団編『在素知齋：大平正芳発言集』、1996年、499頁。

② Joseph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p. vii.

③ “地区化”指的是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推进的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深化。Rick Fawn, “Region's and Their Study: Where From, What For and Where T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2009, p. 13.

④ 毛里和子「総論『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現代アジア学の挑戦」、山本武彦・天兒慧『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挑戦Ⅰ：新たな地域形成』岩波書店、2007年、15頁。

以及基本价值规范的认知不同，产生对立与冲突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也正因为此，地区各国通过不断调整、交涉与协商形成安定的关系才显得十分重要。^① 从这层意义上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中，“太平洋”不过是指涉中美日澳等国所存在的地理空间或是战争（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日本通过战后赔偿与发展援助等手段，引领了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地区化”的进程，但是亚太各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地区合作制度化的运动的确是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之后。正是由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与推进，地区性的政府间组织 APEC 才得以产生，以“亚太”命名的地区方才真正形成。

第一节 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地区主义再次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② 在欧洲，经过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的不断发展，1993年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成立，2002年发行了统一货币欧元，2007年其成员扩大至27国。在亚太地区，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Robert James Lee Hawke，任期：1983～1991年）提出创建亚太地区第一个政府间组织APEC的构想。同年，首届APEC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任期：1989～

① 大庭三枝『重層的地域としてのアジア：対立と共存の構図』有斐閣、2014年、15頁。

② Jagdish Bhawati,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n Overview,” in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 3; Louise Fawcett,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 2; Jens-Uwe Wunderlich, *Reg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pp. 29–52.

1992 年) 在会后表示, 这是“潜在的、历史性的”会晤。^① 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 (Fred Bergsten) 也盛赞 APEC 是“潜在的历史上最具广泛影响力的贸易协定”。^② 1993 年,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提议下, APEC 非正式首脑会议即 APEC 峰会在西雅图召开。此后每年举行的峰会成为亚太地区首脑定期会晤的唯一机制。^③ 在西雅图峰会上, 克林顿高调宣布: “我们的会议标志着亚太新势力在世界舞台的登场。”^④ 之后, 各国首脑们在峰会上穿上由主办国提供的民族服装, 合影留念的仪式已成为亚太地区存在的象征。

创建 APEC 之初,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等 12 个经济体为其首批成员。1991 年,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道加入 APEC, 1998 年俄罗斯也加入其中, 至此 APEC 成为唯一覆盖中美日俄四大国的区域性组织。截至 2011 年, 拥有 21 个成员的 APEC 的区域内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40%; 域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56%; 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7%。在从 1998 年到 2008 年的十年间, APEC 的贸易额翻了三番, APEC 成员间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70%, 明显超越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⑤ 这些数值均反映了 APEC 域内经济快速增长和成员间相互依存的现状, 以及亚太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的事实。

然而, 1997 ~ 1998 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地区。APEC 未能

① 船橋洋一『アジア太平洋フュージョン: APECと日本』中央公論社、1995 年、103 頁。

② Fred C. Bergsten, “APEC and World Trade: a Force for Worldwide Liber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3, 1994, pp. 20 – 26.

③ 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 年、44 頁。

④ Bob Hawke, *the Hawke Memoirs*, London, 1994, p. 433.

⑤ 「APEC 経済データ」、日本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apec/data/data.html [2018-05-05]

为其成员提供有效帮助，各国最终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求救。作为对 APEC 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的无作为的反抗，东盟联合中国、日本及韩国，加速发展了东亚地区合作。这种合作的制度化产物被称为“东盟 10+3”机制。1997 年 12 月，首次东盟“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2005 年 12 月，第九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吉隆坡宣言》，确定将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同年 1 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举行。相比之下，APEC 有关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合作的未来非常不透明，这具体表现为茂物目标的实现困难与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方案的失败。面对 APEC 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合作领域的缓慢进展，伯格斯坦在 2001 年转而断言，APEC 已经胎死腹中（dead in water）。^① 1998 年，俄罗斯、秘鲁与越南三国加入后，APEC 通过了 10 年“冻结”决议，这导致了印度等太平洋地区新兴国加入问题的浮现。^② 而且，“9·11”事件的冲击使 APEC 如何制定亚太地区的安全议程成为紧迫课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亚太地区合作，并且华盛顿方面尝试着跳出 APEC 框架，提出了 TPP 构想，可这样的构想排除了中国的参与，分裂了亚太地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后又宣布退出 TPP，这进一步表明了 APEC 以及亚太地区合作地位下降的事实。即便如此，APEC 仍在以下两方面不可或缺。

第一，关于 APEC 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一词兴起于 20 世纪

^①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② Mark Beeson, *Institu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ASEAN, APEC and Beyond* (Routledge, 2009), p. 50.

70年代，流行于冷战结束以后。它常被用来形容“西方”特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向全球蔓延的趋势。^① 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APEC 提出“开放性地区”的理念。这意味着 APEC 具有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互补的特征，对地区外国家也秉持无差别的自由贸易原则。^② 事实上，创建 APEC 的最初目的是促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乌拉圭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其理念与 GATT 规则具有极强的整合性。^③ 一方面，全球化不仅规范了国家间关系，还要求国家调整其内部制度。与此相对应，作为域内各国为应对全球化压力而设立的组织，APEC 不单单是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措施，还对各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有所帮助。^④ 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而地区主义不仅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取利益，还是控制全球化风险的尝试。柏林墙倒塌后的 20 年被称为“危机的 20 年”，^⑤ 在这 20 年中，发生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次贷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地区主义逐渐抬头。然而，与尚在形成中的东亚地区主义相比，APEC 不仅是“发展中”的地区主义，也是具有包容性及可持续性的地区主义。因此，与其另辟一个新的地区制度，不如在既有的成熟的地区组织框架内深度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机。

第二，关于构建大国间互信的问题。20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美日三国合力对抗苏联成为同时代国际政治的主题之一，亚太地区主

① 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 年、5 頁。

② 大賀哲「『開かれた地域主義』と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東アジア新秩序への道程』（国際政治 158 号）、有斐閣、2009 年、137 頁。

③ 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 年、30 頁。

④ 大庭三枝「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進展とアジア地域主義の変容」、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 158 号）、有斐閣、2009 年 12 月、82 頁。

⑤ 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世界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 年。

义在中美日三国的“黄金时代”中被快速推进。^①这一态势始于中美和解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前提达成的。而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迈进，未来中国将成为能够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亚太地区大国。在此变革期内，如何调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主题。^②为此，中美（G2）合作、中日美（G3）合作等地区制度提案相继被提出。虽然促进大国间对话及政策调整的制度建设十分必要，但这也可能造成其他国家对由大国构建排他性制度的警戒心，间接地破坏亚太地区合作。而 APEC 作为多边合作模式，将中美包含其中，为中美、中国与亚太地区、美国与亚太各国的对话提供了长效机制。因此，为应对大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必要活用涵盖中美日俄四大国的更有“历史”的 APEC 框架。

综上，亚太地区主义将走向何处？亚太地区核心国家美国、日本及澳大利亚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又应该制定怎样的亚太政策？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回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存在于历史之中。为此，有必要回到 40 年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诞生之初，40 年前的亚太地区同现在相似，已然开始直面全球化（相互依存）与构建大国间互信等课题。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亚太地区的现状，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研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第二节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地区主义最初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以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① Ezra F. Vogel, Ming Yuan, Akihiko Tanaka, eds., *The Golden Age of the U.S. – China – Japan Triangle 1972 – 1989*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② 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連帶構想』NTT 出版、2005 年、2 – 3 頁。